

Studies on New Cultural
History & Peter Burke



每下愈况

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



蔡玉辉 著

Studies on New Cultural
History & Peter Burke



每下愈况

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



蔡玉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下愈况: 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 / 蔡玉辉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03
ISBN 978-7-5447-2504-0

I. ①每… II. ①蔡… III. ①文化史学—研究—西方
国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556 号

书 名 每下愈况: 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

作 者 蔡玉辉

特约编辑 王延庆

责任编辑 刘 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625

插 页 4

字 数 231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04-0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谨将此书献给我
敬爱的姆妈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庄子·知北游》

序

彼得·伯克

很荣幸,我的著作又有了一项研究成果,而且是第一本学术专著;在这之前,对我著作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拉美的学生和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发表。这也使我有了一些惊奇的发现:发现自己漫长的研究岁月,发现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但却经常被忘记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著作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些著作是用某个特定的民族,特定的一代人,或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眼光撰写出来的,因此,后代人必定会看到一个不同侧面的历史。

1

20世纪60年代,我在苏塞克斯时有一个学生叫艾丽卡,生于中国天津,说普通话。我在她的帮助下研习《孝经》时曾努力想看懂中文,但遗憾的是,我还是看不懂。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只是阅读专著的英文摘要。看过摘要,我的结论是:本专著作者蔡先生对我的著作进行了准确精当的论析。因此,我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总结我的史学观,只是利用写序言的机会来强调几点。

像任何人一样,在已经有的74年人生旅途中,我一路走来,也可以说,我一路变化着。我已经在《知识分子自画像》一文中尽力去概括这种发展变化的学术特征。我被文化史所吸引是因为我更倾心于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我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所吸引,是因为我喜欢那个时期的绘画、雕塑和文学。但是,我又不想成为艺术史学家,觉得那样太过于狭窄,我想将艺术纳入历史中去研究。因此,我就开始研究精英文化的社会史,写就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1972)一书。

在用社会史的视角审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时,就肯定会发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民众(无论哪一个年代都有大约1 000万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这种“复兴”,正因此,我就对这种大多数人的文化产生

了兴趣。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意大利”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并不是最适合的框架,因为这种研究要么以一个地区为背景(比如托斯卡纳),要么以作为整体的欧洲为背景。我选择了后者,其结果是《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1978)的出版。

在对欧洲进行了“鸟瞰”式的研究之后,我决定回过头去研究意大利,研究其档案、古籍。我原计划写一本关于意大利近代早期的社会史,但研究的结果却是一本论文集而不是专著,那就是《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1987)。这本书的视野要比1972年的《文化与社会》,甚至比1978年的《大众文化》更为广阔,也更具有人类学特征。

读者会注意到,我的研究生涯在研究成果中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集合性走势,即,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最后到人类学特征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史的观点很接近。历史学家,或者说,尤其是英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看作是个体主义者。但是,还不清楚他们是喜欢这种称谓,还是意识到了这一特点,抑或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无论如何,他们都构成了新文化史这一总倾向的一部分。历史是由一个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个体来撰写和创造的,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将我放在我的同侪和同时代史学家的背景下来考察,构成他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重要一面。

这一批批历史学家以前都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地方派,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集中在巴黎,但是现在,借助于国际学术会议和邮件,他们都成为国际性,实际上是全球性的人。每一个个体的历史学家都变成了学者网络上的一分子。我的网络中就包括了欧洲的许多学者,还有些在美洲(特别是在巴西和美国),有几个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还有一两个在土耳其和黎巴嫩。在我看来,这些学者有的是我私交甚笃的朋友,包括有,罗伯特·达恩顿、娜塔莉·戴维斯和卡洛·金斯伯格,还有些是瑞典、西班牙、波兰和其他地方的学者。

成为一群人中的一分子促使一个史学家去选择某一类而不是另一类论题,也促使他们以某一种方式去接近这个论题,但并不强求论断,在新文化史学界,给不同的见解和辩论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比如,我对传统文化史取得的成就持欣赏和肯定的态度,这一点就与我的同侪不同,他们并不这么看(不过,罗伯特·达恩顿也像我一样对布克哈特持赞

赏的态度)。就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变化而言,在历史思想史上,一般来说,书写新的并不一定要通过一场成功的革命将旧的驱逐走,而是与之共存,实际上是与之相互作用,产生出杂交的形式。我还想指出,我对发生在其他一些学科里的变化要比对我的一些同侪所在学科领域里发生的要更感兴趣,我不仅要去向人类学学习,还要去向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和视觉研究学习。

我对自己的介绍已经不少了。读者将要阅读到的是一位学者的研究专著。本书作者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承,将我的著作纳入到他丰厚的学养之下去研究,冷静客观地来加以描述和评价。好啦,该是我退出让他登场的时候了。

2011年9月15日

1 序

1 新文化史之前溯

3..... 第一章 既往文化史的流转

7..... 第一节 精英阶段的文化史

11..... 第二节 民众阶段的文化史

16..... 第二章 文化史观举论

16..... 第一节 布克哈特:文化是精神的本能发展

23..... 第二节 赫伊津哈:文化是骑士精神与游戏的协调

33..... 第三节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46..... 第四节 汤普森:经历、习惯、意识

57..... 第三章 文化史观:传承与流变

77 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

79..... 第四章 新文化史学概观

80..... 第一节 发展历程

86..... 第二节 实践撮要

94..... 第三节 起源与动力

98..... 第四节 结论

103..... 第五章 彼得·伯克的史学观

104..... 第一节 世界是一个整体

117..... 第二节 联系普遍存在

123..... 第三节 多元互补共存

133..... 第六章 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

136..... 第一节 中和观

152..... 第二节 建构观

178.....	第三节 多维观
191.....	第七章 彼得·伯克：评述与定位
191.....	第一节 学术影响
196.....	第二节 在新文化史运动中的作用
204.....	第三节 主要贡献
214	参考文献
228	附录一 彼得·伯克著作目录
233	附录二 彼得·伯克论文目录
255	附录三 彼得·伯克自传体论文
267	后记

新文化史之前溯

在宽泛意义上讲,文化史写作源远流长。可以说,只要有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只要有对这些交往的文字记录,就有了文化史。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除了记载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过程以外,还记录了双方参与战争民众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埃及人的风俗人情,这实际上就具有了文化史的某些特征;由此,在史学界就有“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建议。赫伊津哈也持同样看法,他在《中世纪的衰落》英文版第一版前言中说:“自希罗多德以来,甚至更早,他们关心的是家庭、民族、国家、社会方式和意识的产生。”^①再如古罗马人眼中古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的生活传闻,古埃及人眼中古罗马人的桀骜勇猛,都是带有文化史特征的素材。不过,早期的文化史基本上是以口头的形式流传,这种情况到中世纪有了改变。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不仅记载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还有他人生经历的种种事情,包括他幼时偷窃的蠢事,在罗马与母亲一起经历异象,等等。^②这些关于生活事件,尤其是其中包含了衣、食、住、行内容的记载,实际上就已经具有了文化史的性质,只不过这是非常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史。带有文化史特征的文字记录,伴随着十字军的一次次东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出版物中,其中又以宗教出版物为多。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到欧洲各国经商和观光人数的增加,游记成为记载异国见闻的合适文类,也就成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史写作。彼得·伯克在《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一书中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外国

① 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舒炜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英文版第一版前言”。

②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

人到意大利旅行并写作游记的情况。他将这些记载称为“外来之眼：旅游者的记述”，并指出：“在文艺复兴和大迁徙时期，有许多外国旅游者来到意大利，他们记下了自己的印象。这些印象留存下来，或印刷，或手写，记下的都是他们的原始印象。虽然各异，但具体而又自然，有着第一印象的鲜活。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是其中的著名者。”又说：“严肃对待游记并非相信所记的一切。对游记也像对待其他历史档案一样，需要严格查检，以暴露其具体记载之不确和总体偏见。游人不只是记其所见，也记下大量道听途说，即使是记其亲眼所见，也可能由于不解其文化背景而产生误解。”^①

进入16世纪以后，合着新大陆发现和殖民征服的脚步，有关海上冒险、异国风情、殖民故事等种种经历的记载以日记、游记、报道，甚至小说等各种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读者面前，既成为越来越多冒险家投身海外淘金大军的兴奋剂，同时又担当着异域文化的传递者，为后世的文化史写作积累素材。正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人类各群体之间交往的增多，知识的迅速积累与丰富，人们越来越发现不同群体的人类在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意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差别，从而出现了要将这些相同与不同之处加以记录、研究和表现的冲动和行为。在这个基础上，就出现了文化史。

可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史书写从什么时候开始至今很难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早在二百多年前的德国，‘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一词就已经开始使用。更何况在那之前就出现了彼此独立的哲学史、绘画史、文学史、化学史和语言史。我们发现，18世纪8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人类文化史或某些特定地区或民族的历史。”^②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史以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为开端。该书译者指出：“在伏尔泰以前，史学家多半效法希腊和罗马的楷模，以纪传体为主。传统的写法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兼论当时的帝王将相。伏尔泰却一反以前的写法，把人物放

^① Peter Burk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Early Modern Italy—Essays on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5, 16, 18.

^② 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二版），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在广阔的时代范围内来评述。在本书里,除了政治、军事以外,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艺、科学都说到了。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应有的地位上。因此,本书是阐述人类文明的最初尝试,开启了世界文化史的先河。”^①这样的观点并非个例。有人认为:“启蒙时期伏尔泰的两本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先例……伏尔泰重风习而轻战争,从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伏尔泰制订了一种独创的、独立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史观。它成为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滥觞。”^②也有学者指出:“伏尔泰的两本史学代表作《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可以看作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③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关于西方文化史,一般还是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看作是学科意义上文化史的正式开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只有它才具备了文化史的基本条件:以某一文化体(不论大小)在某一阶段(或长或短)内文化(器物、制度、观念)的发展变迁为考察和表现对象,并以此构成主要内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表现。虽然伏尔泰的上述两本著作已经有意识地将风尚和习俗作为讨论的内容,虽然休谟的《英国史》也已经注意介绍风土人情,但都不符合学科文化史的要求。

对于文化史的写作与分期,更是百家争鸣,难有统一看法。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将文化史书写的起点放在1800年,分为四个阶段,即1800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古典阶段,20世纪30至50年代的艺术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发现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文化史阶段,对这一百多年来的文化史写作进行了全面而简练的扫描。^④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都是按照通常的历史分期来划分文化的发展演变,分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这两个大的阶段,再按照这两个阶段来构架所讨论的文化史实变迁的轨迹。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也是按照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三大块来建构其文化行为与观

① 吴模信等:《路易十四时代》译序,见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赵立坤:《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5—115页。

③ 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 见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6—7页。

念变化的框架,基本上是以时间顺序来分期,而不是像伯克依据不同的内容给每一个阶段一个名称。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考察的是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的“形成史”,基本上是按照内容的分类结构全书的框架,三个部分大体分为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和工人意识存在,而以工人经历作为主线串联全书的内容。到了我们新文化史阶段,书写方式更是多样。有以某一种人类活动为对象进行专门考察,如“阅读史”、“体育史”、“印刷史”、“绘画史”、“性史”,等等。有以身体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身体史”;有以某一山村在某一阶段的生活事件为对象考察的,如拉杜里的《蒙泰尤》;有以某几种文化之间关系的变迁为对象考察的,如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可说是不一而足。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史起自1860年,也就是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到21世纪初年的当下,时间覆盖约150年。笔者认为,粗略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写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860年代到1940年代的精英时代,1950到1960年代的民众时代,1970年代以来的新文化史时代。具体而言,文化史在这三个不同时期有着很不一样的学科地位。在布克哈特、赫伊津哈、埃利亚斯等文化史学家的笔下,文化主要指的是属于上层人士的文学、艺术、建筑、宗教、饮食习惯等等,因此文化史也主要是记叙这些主体在这些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文化史的待遇在不同史学流派眼里各有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来,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为经济和生产关系所决定,并附属于经济史和政治史,这种局面到60年代被汤普森打破。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看来,日常生活只不过是浮在浪涛表面的泡沫,是不能持久且无法反映出历史的结构性变迁,因此,文化史写作也就要让位于经济史、物质史等长时段的历史。在克利奥学派眼里,只有那些具体的统计数字和事件才能说明历史的变迁,并从中体现出规律,与观念和思想相联系的文化是不能够说明这些的,因此,文化史写作自然不能作为他们研究的主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批微观史学著作的问世,文化史写作朝着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大幅度倾斜,到80和90年代,其触角伸向了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其蔓生覆盖之势,犹如冰河时代之冰川,带来了整个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

就大势而言,从1860年到21世纪初150余年欧洲文化史写作实践经历了一个“从上向下”、从窄到宽、从精神到日常生活、从单向到多维、从聚焦到弥散的发展过程。从微观角度,这些特征体现于文化史写作的主要方面,如观念、内容、重心和方法等等,换言之,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切入,讨论自布克哈特时代到汤普森时代文化观念的嬗变更迭,文化史料的扩展取舍,文化传统的传承创新,文化视角的拓宽逼仄,文化内涵的膨胀泛化,文化地位的起落浮沉,诸如此类。在精英或贵族阶段,文化史表现或记叙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的上层人士的观念、行为、生活、习俗等等。在民众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史学和计量史学大行其道,但文化史在历史学科的地位相对下降,成为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附庸。在新文化史阶段,“文化史,昔日学科之林中的灰姑娘,曾经被那些更为成功的姐妹瞧不起,却在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发现”。^①表现和记叙下层民众生活、观念、行为、习俗的逐渐增多,并渐次成为主流。

本章主要梳理精英阶段和民众阶段文化史写作的主要线索,从观念嬗变、内容变化、重心位移、方法更迭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文化史的沿革与流变,试图在描画出其变化轨迹曲线的基础上,总结出其主要特征,厘清其脉络,描画出其趋势,从而给读者提供一幅欧洲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一百余年文化史发展的总图像。

第一节 精英阶段的文化史

考察文化史发展的轨迹,无论从观念的指导还是从史料的采用,我们都可以看出一条“从上向下”的运行曲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上”是一个宽泛而并不严密的指称,其所指与英国史学界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出现的“自下而上”史学潮流中的指称恰成对照。这里所说的“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层级,另一是指眼光或态度。作为社会层级,精英阶段文化史表现的对象主要是上层阶级,包括国王及其皇室、大臣、贵族这样的统治阶级,包括教皇、大主教、主教等这样的上层僧侣阶级,还包括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学者等这样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

^① 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1页。